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ZHONGGONG DANGSHI ZHUANTI YANJIU

主编 王恩宝



東北大學出版社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主 编 王恩宝

副主编 高嵩峰 李 波

东北大学出版社

· 沈 阳 ·

© 王恩宝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 王恩宝主编.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517-0041-2

I. ① 中… II. ① 王… III. ① 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IV. ①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7195 号

出版者：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 3 号巷 11 号

邮编：110004

电话：024-83687331(市场部) 83680267(社务室)

传真：024-83680180(市场部) 83680265(社务室)

E-mail：neuph@neupress.com

<http://www.neupress.com>

印刷者：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发行者：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145mm × 210mm

印 张：9.375

字 数：255 千字

出版时间：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牛连功

责任校对：石玉玲

封面设计：刘江旸

责任出版：唐敏智

ISBN 978-7-5517-0041-2

定 价：30.00 元

目 录

一、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1
(一)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 深入的必然结果	1
(二)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的产物	7
(三)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伟大意义	25
思考题	33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34
(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影响	34
(二)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45
(三) 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54
(四)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59
(五)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75
思考题	81
三、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82
(一)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	82
(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构想	86
(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90
(四) 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98
(五) 对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评价	111
思考题	116
四、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17
(一) 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117

(二) 党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的继续探索	133
(三) 1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成就	140
(四) 10年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失误的主要原因与教训	143
思考题	147
五、“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148
(一)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148
(二) “文化大革命”的简要过程	158
(三)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恶果	162
(四)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168
思考题	177
六、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实现	178
(一) 党和国家事业在徘徊中前进	178
(二) 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实现	188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基本经验	204
思考题	210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211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	211
(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	252
(三)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与历史启示	259
思考题	262
八、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	263
(一)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进程	263
(二)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	274
(三) 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使命	288
思考题	294
后记	295

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无数仁人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从多方面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然而，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和先进阶级的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斗争相继失败。历史呼唤着新生的革命力量，期待着先进阶级的领导。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五四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和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当历史步入近代时，中国却落伍了。

19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长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1840 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清政府屈服，订立不平等条约。此后，在 1856 年到 1860 年的英法联军

对中国的战争、1884 年到 1885 年的中法战争、1894 到 1895 年的中日战争、1900 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又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其中两次占领中国的首都。1904 年到 1905 年，日本同俄国又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了战争。几十年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不断地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中国的许多特权，使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外国企业、社团几乎完全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他们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由它们管理的港口、“租界”，并且划分势力范围。它们的海军、陆军能够进入和驻扎在中国的领海、领土。它们控制中国财政和经济的命脉，操纵中国政治和军事的实权。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掠夺。由于外国侵略者之间存在着争夺中国的矛盾，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民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中国才没有灭亡。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保持着独立，但实际上已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前，中国封建社会里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主要是在城市中，而且很微弱。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遭到破坏，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起来。但是，帝国主义者为了统治中国，尽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是逐步地演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历史证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是近代中国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总根源，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基础上，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如何反对封建专制，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到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无数中国仁人志士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龚自珍、魏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当时的世界上，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富强的。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只要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像他们那样建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就能得救。这些人按照西方的道路进行了 70 多年的英勇斗争，但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从 1851 年到 1864 年，前后坚持了 14 年，活动遍及 18 个省。太平军在南京定都后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采取了许多措施，特别是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耕地，希望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天国”，使农民摆脱封建剥削。这虽然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是，由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因而他们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不可能真正实现。在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后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过一个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他认为，中国不仅要像西方那样，办工业，开矿藏，兴银行，设新闻馆、书信馆，而且要“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则“宜令其做工以受值”，即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的主张，在许多方面得到了洪秀全的肯定和支持。但太平军最后终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清朝政府的联合进攻下遭到失败，洪秀全殉难，《资政新篇》的主张也就无从实行了。

1898 年，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看到封建制度的腐败和落后，设想以资本主义制度来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因而力主变法维新，以达到“富国强兵”。

他们强调要学习“外国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亲”，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他们要求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设立学堂，学习西方；奖励创办报刊，保护农工商业；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以及精练海陆军，改用新法操练等等。中国人当时学习西方的态度是十分热烈和虔诚的，学习的内容是逐步深入和相当全面的。近代中国早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民智者，富强之源”，“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当时，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即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就可以救中国。康有为曾乐观地预言：“大抵欧美以 300 年而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 30 年而摹成治本。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则 3 年而宏规成，5 年而条理备，8 年而成效举，10 年而霸业定矣。”然而，戊戌变法，犹如昙花一现，仅 103 天即告失败。光绪帝被幽囚，康有为、梁启超出走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赴死，除保留一个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外，戊戌变法的改革措施大都被废除。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一次具有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毛泽东曾经这样评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① 孙中山参照欧美的经验，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这场革命的目标是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清朝统治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孙中山说过：“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实现，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世纪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 20 世纪中国所发生的一次历史性巨变，这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63 页。

帜，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更加勇敢地奋斗。辛亥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各阶级、各基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各种名目的政纲、政论、宣言遍布报刊。过去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严禁的政党组织，这时竞相宣告成立。这无疑有利于吸引和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有利于培养人们的民主精神和现代公民意识。从此，中国开始走出家族统治和王朝更替的封建社会形态，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加快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后，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几个派系，分别投靠各帝国主义。从形式上看，中华民国成立了，有约法、有国会，也有若干公开活动的政党。但实际上，全部政权都操纵在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手里。所谓“民国”，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招牌而已。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①

为什么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无一不是以失败而告结束？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这首先是因为，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来到中国，不是为了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外国资本在中国根深蒂固，都企图

^①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9页。

用殖民政策来补救和发展自己。它们绝不会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来妨碍其利益的实现。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①

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而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除了封建势力以外，还有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正因为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为了战胜它，革命营垒需要有坚强的领导者、组织者。在中国，最广大的群众是农民，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是，农民由于受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存在许多弱点。他们看不清斗争的前途，提不出明确的斗争纲领，难以抵制封建主义的影响，无法形成持久、牢固的团结，因而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者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不满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是，由于其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具有软弱性。它一产生，就受到外国资本的排挤，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以及封建专制政治的压迫。所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艰难，它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极小，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民族资本中，大部分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主要是一些轻纺和食品工业，它对外国资本有很大的依赖性，所以不敢彻底地反帝。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有密切的关系（一些资本家的资本是由地租转化的，一些资本家获利以后到农村购置土地出租，兼事封建剥削），所以它也不敢彻底地反封建。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既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也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因而，民族资产阶级也担当不了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任务。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9页。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要完成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大革命任务，并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就需要依靠新的革命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个阶级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这个政党就是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政党。可见，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正是适应了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客观要求。

(二)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无产阶级政党，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条件和共同规律。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必须具备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二是必须使建党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具备了这两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1.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阶级基础

政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世界上没有超越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是以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基础的。

中国工人阶级，是指在中国近代社会靠出卖劳动力，不拥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劳动成果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剥削的群体和阶层。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三种资本主义，即外国资本主义、中国封建官僚资本主义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的。

19世纪4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这时中国本身还没有近代大机器生产，这批工人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的厂矿企业中出现的。

19世纪6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发展清王朝的工业经济，以维护

封建反动统治，开展“洋务运动”，在各地建立了一批“官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等，在这些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

19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有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如缫丝、棉纺、面粉、造纸等。这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在这些近代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

据统计，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在19世纪70年代大约有1万人左右，80年代时增加到4万人，到1894年，约有10万人。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增加到100万以上。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西欧一些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应付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侵略，这就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再加上日、美帝国主义也在此期间扩大在华投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万人以上。工人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一些，它的社会基础也更广泛一些。

近代中国的工人阶级，除了产业工人这一主体之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所从事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业工人、苦力运输工人、农业雇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普通职工等，其总数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估计约为4000万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同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消灭一切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制度，使全人类由阶级社会过渡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才能最后解放自

己，所以，从阶级性上说，它是最富于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的阶级。工人阶级也最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富于团结协作精神，最少保守思想，最具革新进取精神。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工人阶级是一个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除具有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共同的特点和优点以外，还具有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特点：第一，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本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一般在 12 小时以上，有的长达 16 小时。在尽可能延长劳动时间的同时，中外资本家还经常采用提高劳动强度的方法，诸如增加劳动定额、加速机器运转等，来加强剥削，结果导致中国工人健康状况普遍恶化，有的竟被活活累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比，中国工人工资水平低，劳动条件恶劣，而且缺乏人身自由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各工矿企业还普遍保留着各种封建性的剥削制度和野蛮的管理方法，如包工制、监工制、包身工制、养成工制等，使工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种种限制。中国工人阶级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生活极端困苦，社会地位低下，具有改变自己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第二，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虽少，但由于近代工业的布局和结构不平衡，产业工人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如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青岛等地，分别集中了十余万乃至数十万的工人。据 1894 年的统计，仅上海、广州、武汉 3 市的工人，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 77% 以上。产业工人这种集中的状况，加上广大非产业工人与之结合，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有利于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展革命力量，从而便于在工人集中的大城市中，形成相对强大的斗争力量。第三，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因而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劳动人民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痛苦和要求，便于发动和组织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参加反帝反封

建的革命斗争，建立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广泛的革命联盟。当然，中国工人阶级也存在一些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相比），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文化水平低（和资产阶级相比），比较容易接受小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的影响，等等。

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点和特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革命性很强、特别能战斗的阶级。它从诞生之日起，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就不间断地进行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各种斗争，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还处在自发性的低级阶段。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中国工人运动有了迅速发展，开始具有自觉性的萌芽。其表现为：第一，工人罢工规模扩大，罢工的次数和参加人数逐步增多。据统计，从 1870 年到 1911 年的 40 年间，工人罢工约 105 次；而从 1912 年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的 7 年间，工人罢工就达 130 次。第二，工人的斗争开始由分散的斗争转向有组织的斗争，工人在斗争中逐步抛弃过去的行会、帮会和秘密结社等组织，在一些城市开始组织工会。第三，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同盟罢工开始出现。第四，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这时已经出现独立进行政治斗争的萌芽。例如，上海、长沙等地工人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6 年，天津法租界工人为反对法帝国主义侵占老西开的斗争就是明显的表现。到了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军，显示了它的伟大力量，并且在运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形成全国规模的政治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初步发展，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在五四运动中的提高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表明在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列宁早在 1912 年对中国工人运动做过这样一个预言：“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

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①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列宁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2.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思想基础

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必须以先进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正如列宁所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②

然而，工人运动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对工人运动的科学总结，是科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7年3月（俄历2月），俄国工人和士兵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统治俄国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但国家政权最终落入由地主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组成的临时政府手中。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列宁的领导下，彼得堡的工人群众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反动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第二天，全俄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以及其他一系列维护工农利益的决议案。随后，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各地相继建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它唤醒了西方的工人阶级，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西方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开始汇合，如海潮汹涌，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堤防。从此，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的新格局。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俄国地大人多，在沙皇统治时期政治腐朽，国情与中国有

①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页。

②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相似之处，而且与中国有漫长的边界相接。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明取消帝俄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领土的一切特权。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没有过的，从而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明显地感觉到，俄国工农大众敢于冲破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明帝国主义的力量并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不再是孤立无援的。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侮而又在反帝斗争中屡遭失败的中国人民，因此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而又茫然无措的中国先进分子，则由此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俄国十月革命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敏锐地感受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并且很快在实践中得出向俄国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① 的结论。

早在十月革命前，工人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写下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十分关心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也有人介绍或提到过。如梁启超在1902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马克思的名字；朱执信在1906年写的《德意志劳动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以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据一份材料介绍，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在中国出现是在1898年夏由胡胎谷（胡颐谷）翻译英人克卡朴所著《社会主义史》，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中。但是，由于缺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因此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大多数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